

论西欧多党竞争中反体制政党的体制性整合

李 硕

内容提要:反体制政党是西方极化多党制的产物,它们在削弱其反对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上存在着共性。本文将意识形态距离设定为控制性变量,根据反体制政党的不同作用方式,建立起政党竞争的中心逃离与中心聚合模型。魏玛共和国与意大利共和国的案例分别验证了这两种不同的作用模式。反体制政党实现体制整合的关键在于审慎地处理“政党意识形态悖论”。这一悖论包含双重矛盾:其一,在政党竞争与社会碎片化的压力下,既要强化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又要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其二,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博弈与实用主义层面的政治交易往往同时存在,成为政党的两难抉择。

关键词:反体制政党 中心逃离 中心聚合 意识形态悖论

在多数情况下,政党以行使国家权力为目的,以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为要旨,或一党单独执政,或联合其他政党共同执政。但是目前也存在一些受到关注较少,却比较重要的例外情况,即某些政党的行为并不以推动政府组建为目的,而是走到反体制的道路上。这里的“反体制”大多体现在政党对政体的合法性态度上。反体制政党大部分诞生于欧洲大陆国家,并致力于维护一种有悖于政治系统核心价值观的亚文化,削弱政治体制的支持基础,是一般意义上多党竞争的产物。对反体制政党的考察,既需要对单个政党展开研究,也要探讨各政党之间相互的政治竞争。本文试图解释不同的西欧反体制政党在不同的作用模式下,如何与其他政党进行互动,这样的反体制政党最终是被和平吸纳?还是以其政治活动导致整个政治体系产生重大变革?在此基础上,通过案例验证,探询不同的政党互动逻辑背后蕴藏的动力。

一 反体制政党的概念界定

反体制政党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碎片化以及思想分裂程度高度相关,^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特定的选举规则,它不仅形塑政党体制,也是反体制政党得以生存的前提。简单说来,选举制度就是将公民的选票转换成为代表议席的一整套方法,包括三个关键性指标,即选举公式、选区规模以及当选门槛。^②反体制政党的存在是具有一定前提的,即在选举制度的规定上,一般要求复数选区采用最具比例代表性的选举公式,同时当选门槛又相对较低。^③这样的制度规定实际上鼓励了政党的泛滥,导致某一政党在议会中拥有简单多数变得十分困难。^④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将这种选举制度所带来的多党竞争的局面称之为“极化的多党制”,反体制政党就存在于这种极化的多党制^⑤中。

若要界定反体制政党,首先应该理解什么是“反体制”,这可以从反对态度与反对目标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反对本身体现为一种态度的回应,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产生深浅不一的变化,可能从初期微小的异化演变成最终彻底的决裂。其次,反对一般是有一定的目的性,或者说是具有目标指向的。从这两个层面理解,反体制政党的所谓“反”主要体现为该政党对政体合法性的态度,可能表现为拒绝型或是抗议型,态度有弱与强的差异,但目标都指向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即怀疑政治体制本身并试图削弱其支持基础。简而言之,各种反体制政党在“削减合法性”上存在最基本的共性。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讲,只要一个政党试图削弱其所反对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就可以将其定义为反体制政党。反体制政党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反体制政党带有天然

① Richard S. Katz and Peter Mair, “Cardre, Catch-All of Cartel?: A Rejoinder”, *Party Politics*, Vol. 2, No. 4, 1996, pp. 525-534.

② 选举公式例如相对多数决定制、各种不同形式的比例代表制以及其他等;选区规模是指每一个选区的应选名额;当选门槛是指一个政党为取得代表权所需的最低支持度。这些要素对政党制度造成重大的政治影响。参见[美]阿伦·李帕特:《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1945-1990年27个国家的实证研究》,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③ 一般在初始状态中,反体制政党多以小党的面目存在,而小选区与高门槛是相同的,都限制了比例代表性与小党赢得议席的机会。基于对西方57个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的考察,要达到最低程度的比例代表性,选区规模至少是2个议席,而根据塔格佩拉和舒特加简单有效门槛的计算公式—— $50\%/M$ (M :选区规模),低位门槛至少要在20%到25%以下。作者注。

④ 比如早期纳粹党就在这样的选举制度中获得了选举的机会,而在英国这样的相对多数决定制中则不可能。作者注。

⑤ 萨托利对政党制度的分类模式超越了以往仅仅考察政党数目的方法,他的分析围绕政党的碎片化和政党所信奉的意识形态距离这两个变量展开,将极化多党制作为多党制的一个重要类别加以探讨。这样的极化多党制一般存在5个或以上的政党规模,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较大,而且会有相关的反体制政党出现。参见[意]C·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10页。

的外源性意识形态,在多数情况下与现行政体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最远的距离,难以被接纳进政府;第二,它们往往反对政治体制本身,而非单纯地反对某一政府或者某一政党;第三,反体制政党力主寻求与现存政治秩序相异的政治运作模式,构建与之相悖的信仰体系。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根据反体制政党的政治态度从异化、拒绝到抗议的烈度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抗议型和革命型的政党。抗议型的政党或许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态度,可能以反对某项议题或某个政策为主旨,是短暂的露水政党;也有可能以反自由民主等西方主流文化的姿态长期存在。革命型政党以推翻现存政体为目标,一般来说反抗的程度更强烈。虽然抗议型政党体现了更多的政策或者议题指向,但是在对政体合法性的反对态度上与革命型政党是一致的。

反体制政党诞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在一些具有代议制传统的欧洲国家,政党组织发展缓慢且被认为是合法的参与者,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具有近代意义政党的诞生意味着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民主制的到来,^①而某些国家的部分政党组织却并非如此。这些国家可能存在通过发展民主来反对长期威权统治的期待,但是在民主政治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专制复辟或者极权逆转的趋势。^②此时,前政权的忠诚拥护者以及希望加快革命进程的人们都有可能对民主政治本身产生质疑,由此出现了反对民主政治游戏规则政党。这样的情况出现于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欧洲某些多党制国家,这一时期的反体制政党大多是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的政党。此外,也包含那些为追求某种形式的区域独立或地方主义而成立的政党。反体制政党的发展所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对政治体制产生“支持匮乏”,从而削弱政体合法性。然而,“反体制”不是完全的自外于政治体制,它们也会以审慎的态度参与选举,尽量通过平稳的方式参与政治体制运作。^③也就是说,作为社会裂化的反映,它们代表一定群体的政治诉求,对社会与政治体制进行持续和平的渗透。然而,如果这样的反对或者抗议声音一直持续下去,就会带来政府内部的整合危机,以及政府外部的选民支持的分裂和匮乏,最终动摇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因此,如何将反体制政党吸收内化,也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①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页。

② 参见[美]拉里·戴蒙德、理查德·冈瑟主编:《政党与民主》,徐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

③ 比如一些社会主义者谨慎地参加选举政治,只是为了宣传的目的,并且不与其他政党结成任何同盟,不接受任何妥协。尽管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普选权作为一种工具,具有从阶级斗争中解脱出来的无与伦比的优点。但许多人认为,普选权充其量不过是各种工具中的一种。参见[美]亚当·普热沃斯基:《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丁韶彬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二 反体制政党的空间竞争模型

政党竞争模型可以看做是制度主义方法的一种变体,它将面对选民彼此竞争的政党看做是行动者,政党可以调整而且也确实调整了自身的意识形态以回应选民的价值观念,从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形成竞争-回应的通路。采取这种研究方法的代表性学者是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他把选民偏好和政党行为看做是两个自变量,建立了单维意识形态光谱,并根据政党的立场与观点研究其空间分布。^①在他之后形成了一批“空距理论家”,如伊恩·巴奇(Ian Budge)、戴维·罗伯逊(David Robertson)等。巴奇对19个“自由民主”国家进行了考察,将每个政党就某一特定议题所表明立场在“意识形态空间”中标示出来,发现正如唐斯意识形态光谱所显示的,在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的政党竞争都可以解释为一种左右对立”。^②萨托利也认为,政党竞争倾向于沿着一个线性的左右空间展开,并展现出意识形态格局。^③将政党视为拥有某种意识形态的组织,以此作为研究的开端,然后建立政党意识形态与政党竞争之间的关联,成为研究政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法。本文正是遵循这样的方法与传统,尝试建立反体制政党的竞争模型。

萨托利曾经指出,政党制度的最重要特征在于政党的竞争方向,也就是围绕意识形态光谱中心位置产生的向心或者离心竞争。由于政党竞争是沿着左右向度的意识形态光谱展开的,存在于极化多党制中的反体制政党就展现出意识形态格局的双边性。这是因为,如果反对都是来自于意识形态光谱的一个极端,那么不论这样的反对者数目是多少,都存在形成政党联盟进而组建替代政府的可能。所以反体制政党在意识形态光谱中的位置应该是两翼平衡,并且彼此相互排斥,难以联合组阁。如果将政体内政党意识形态的变动范围,以及政党对政体自身和政体内其他政党的态度作为变量,考察政党之间的竞争,则可以发现反体制政党一般位于意识形态光谱的两极,并保持着与光谱中心位置政党最远的意识形态距离或者最深的意识形态分隔程度。在度量意义上而言,存在反体制政党的意识形态光谱中央位置是被占据的,作为中心焦点,不仅必须面对左与右的拉动,同时也处于左、中、右三方互动的格局。由于不同的作用

① [美]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② Ian Budge, David Robertson and Derek Hear, *Ideology, Strategy and Party Change: Spatial Analyses of Post-war Election Programmes in 19 Democrac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92.

③ [意]C·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第458-469页。

机理,包括反体制政党在内的政党竞争会形成两种不同的竞争模型。^①

第一,中心逃离模型。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左右向度两极存在着深刻的分野。如果两极的反体制分离力量加大或者分裂程度增强,超越了中心地带的稳定控制,将会造成政党体制平衡性丧失,进而冲击整个政治秩序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位于意识形态中间位置的政党力量持续减弱,选票就会不断流向光谱中某一极的政党,抑或是均衡的流向两极,形成两翼政党对中心的双向拉力与外向逃离。这样来自一方或者两方的作用所造成的逃离中心的过程就形成了反体制政党的中心逃离模型。

第二,中心聚合模型。意识形态光谱中间位置的政党没有被两翼的反体制政党超越,与此相反,政党之间由于彼此之间意识形态的和解,做出了态度的改变与调整,从空间竞争的角度看,形成了中间力量对两翼的驱动与拉聚,反体制政党接纳了基本的游戏规则,政党体制由于多方的协商与互动,保持了较为稳定的状态,这就是以意识形态中心为合力的聚合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反体制政党能够有效地被政治体制整合,原来试图挑战政体合法性的愿望逐渐降低,或者被重新合法化。

需要指出的是,中心聚合模型与中心逃离模型并非是静止、一成不变的。两种模型之间还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可能。原本处于分离状态的两极也可能由于条件的改变力量削弱,从而向中心聚合;反之,起初处于中心聚合模式下的反体制政党可能随着条件的变化突然扩大外向性的拉力,形成逃离模式对聚合模式的超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拉力持续性增强,逃离倾向达到最大程度,反体制政党的去合法性就会对政党体制产生分裂性的影响,同时政治体制的稳定性也会面临挑战。

三 案例研究

虽然在若干历史时期,西欧的某些国家出现过两党制或一党制,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竞争性的多党制更加符合西欧的政治传统,并且在 20 世纪多样化的政党制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存在于竞争性多党制中的反体制政党,也更多地活跃于西欧的政治舞台,并表现出中心聚合与中心逃离的不同作用模式。最终,或被政治体制整合,或导致政体最终崩溃,而产生不同结果的内在动因,只有通过个案验证、相互比较,才能够清楚地呈现。

^① See Giovanni Sartori, "European Political Parties: The Case of Polarized Pluralism", in Joseph La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 et al.,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37-138.

(一)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是一个代议制和联邦制的民主共和国,1919年8月制宪会议通过了新宪法,^①继承了普鲁士和第二帝国时期的普选制形式。魏玛全国立宪会议采用“巴登制度”,即各政党或团体的候选人名单每得1万张选票即得一席;全国各选区未用上的选票累积,按规定的原则比例分配,最多得7500张选票的政党或团体即分得一席,议席总数不按人口数量固定,而是按照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确定。^②这一最大限度的实现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由于较低的当选门槛造成了政党丛生、政治意见“原子化”,同时也为反体制政党提供了栖身之地。碎片化的政党造成了政府体制的不稳定。虽然复决或全民公决的手段经常被使用,但是依然没有起到建立稳定政府的作用。从1919年2月13日到1933年1月28日,魏玛共和国在短短14年的政治生命中,经历了21次政府更迭,内阁的平均寿命不足8个月。从1920年6月6日到1933年3月5日之间举行了8次国会普选。^③

魏玛共和国时期大小政党数目一百余个,但有效议会政党数目只有二十多个。各个政党之间的政治态度与倾向差异明显,从极左、左派、中左、中间到中右、右翼、极右各有分布,在意识形态光谱上都占据一席之地。主要的大党也是如此,按其从左到右的分布,大致包括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中央党、人民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等。反体制政党不仅涵盖了具有极端情绪的政党,也同时包含了那些没有明确政治倾向,但却代表着小区域或小团体利益,凭借最低限度的支持就能够获取一个席位的政党。从政党的发展历程上看,位于意识形态光谱中间位置的几大政党,如社会民主党、中央党与人民党虽然一直实力强大,但是鉴于政治立场、代表利益以及阶级构成方面差距显著,难以走向联合,由此造成政党竞争的中心位置力量不断弱化,平衡能力日益萎缩。而位于左右两端反体制的魏玛共产党和纳粹党虽然最初位于议会之外,但是发展力量却不可小觑。

① 1919年8月11日,临时帝国总统艾伯特签署魏玛全国立宪会议通过的宪法,帝国政府全体部长副署之。8月14日,颁布宪法,是日魏玛宪法生效。参见蒋劲松:《德国代议制》(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5页。

② 从1869年起,整个德意志帝国划分为若干选区,并按照单选区制和多数选举制选举帝国议员,小党每每选举无果,愤愤不平,同时妇女也没有选举权,新的选举法令革除了这些弊端,主张“缩微式”代表,也就是议员构成要反映社会的人口剖面图。但这也造成了政治团体不断繁殖,多数派难以形成。参见蒋劲松:《德国代议制》(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8-1130页。

③ 参见[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下册),范德一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53-560页。

表 1 魏玛共和国帝国议会的政党选举份额 (1919-1933 年)

政党名称	1919	1920	1924 (5月)	1924 (12月)	1928	1930	1932 (7月)	1932 (11月)	1933
独立社会民主党	8	18	-	-	-	-	-	-	
共产党	-	-	13	9	11	13	15	17	12
民主党	19	8	6	6	5	4	1	1	1
社会民主党	38	22	21	26	30	25	22	20	18
中央党	19	14	13	14	12	12	12	12	11
人民党	4	14	9	10	9	5	1	2	1
国家人民党	11	15	20	21	14	7	6	8	8
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	-	7	3	3	18	37	33	44
巴伐利亚人民党	-	4	3	4	3	3	3	3	3
商业党	-	-	-	-	5	4	-	-	-
农民党	-	-	-	-	-	3	-	-	-

注：* 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德语缩写 NSDAP),简称纳粹党。

资料来源：[英]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附录 2；[意]C·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第 225 页。

分析魏玛共和国的历次选举,14年中除了中央党以外,其他政党在议会中所占比例产生了巨大波动。1920年以前可以看到压倒性的“左倾”优势,而到1930年以后右倾浪潮的翻转带来了颠覆性后果,中心逃离倾向十分明显。在后期,位于中左位置的民主党及其中右对手人民党甚至面临失去席位的命运。中心地带的真空被左派的共产党和作为极右势力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填补,形成了两翼对中心的超越。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最终由于中心逃离模式的巨大作用而分崩离析,其原因值得深入思考。

首先,位于意识形态中间位置的政党力量涣散,缺乏可行性共识,在激进主义中间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① 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建立之初,表现出最大的积极性,主导着政府的各个部门,在议会中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共和国存续的14年中,它不断忍受着来自左右两派的压力,本应负起重要责任。然而,无论是从领导组织还是从政党传统看,社民党显然都没有做好承担领导责任的准备。党内精英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人问题和社会主义理论上,并没有为获取政权勾画蓝图,其首要任务也不是

^① 参见[美]米尔顿·迈耶：《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王崇兴、张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96 页。

开展议会工作和制定冷静的改革政策。^①当社民党人终于在1924年建立了国防组织“国旗社”时已为时过晚,无法与已经巩固了阵地的右翼军事组织相抗衡。更为关键的是,与共产党和纳粹党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相比,社民党一直恪守传统,缺乏足够的创新精神和现代化的宣传技术,难以争取到那些已经倒向极左或者极右政党的群众,导致选票不断流失。另一个位于中间位置的政党中央党,虽然在议会选举中长期占据一席之地,但却一直没有产生平衡两翼的效用。纵观该党的发展历程,除了宗教教派和宗教利益方面外,在其他任何问题上都不是团结一致的党,开始时还曾得到许多知名人物如马克斯·韦伯和弗里德里希·诺曼等的拥护,但是后来他们都退出了。团结性的丧失、政治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右翼民族主义者的鼓动,导致追随它的群众很快就离去了。人民党的选举情况从1924年以后也是不断恶化的,在1930年的选举中,选票大量丧失,只有1920年的大约三分之一,这样的失败也是无法扭转的。人民党曾将其在1920年的成功归因于当地农场组织的支持,但是仅仅数年之后,这一政党的支持者仅剩下了一些技术工人以及一些传统的中产阶级。^②

其次,极左与极右力量壮大,先后形成对中央位置的超越。相较位于意识形态光谱中间位置的政党,极左的魏玛共产党在当时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除了苏联共产党以外,人数最多、力量最为强大的共产党。但是这样强大的共产党虽然改变了政党竞争的格局,最初形成对中央位置的取代,最终却未能赢得议会的绝对多数。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的政策制定过于简单,缺乏自主性,基本上听命于对苏联。到了1925年,对莫斯科“唯命是从”的恩斯特·台尔曼经选举成为共产党领袖后,这样的情况就愈演愈烈了。另一方面,魏玛共产党一直为政策的摇摆、派系的斗争和领导集团的清洗所折磨。同时,共产党与左派其他政党也无法形成联盟。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中,共产党所攻击的对象并非反动的右翼政党,而是社会民主党内的无产阶级。斯大林曾对《红旗报》的记者说,德国共产党应代表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因此,德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压倒社会民主党,把它削弱为无足轻重的少数派。^③就在中间派政党无法形成稳定政府、左派政党陷入分裂之际,纳粹党不断进行煽动性宣传,发动集会游行,急剧左右着民意,将各种极右运动一点一点吸引过来,而魏玛共和国任由这些运动发

^① 社会民主党将自己封闭在拯救未来的希望里,一步步地脱离社会现实,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社民党人在20年以后经常隆重地举行众多的开幕式、节日和纪念活动,而其内容是表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信念艺术的朗诵和表演。参见[德]弗兰茨·瓦尔特:《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张文红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38-39页。

^② Larry Eugene Jones, *German Liberalis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Weimar Party System, 1918-1933*,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pp.115-222.

^③ 参见[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下册),第553-560页。

展繁衍。^① 在 1932 年 7 月和 11 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最终获得了多数党的席位。尽管在内阁组成上限制了纳粹党的入阁人数,兴登堡总统还是不得不于 1933 年 1 月任命希特勒为政府总理。^② 极右翼势力成功地占据了选举的高地,原有的政党体制瓦解,中心逃离模式走入极端状态。

从总体上看,魏玛的政治形态可称为“多极政治”,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状态混乱,而这些力量力图使政府屈从于它们的意志并使领导不统一。^③ 魏玛德国时期的政党结构或许可以说是一个政党林立、互不妥协的极化政党体制,在很多即便是很细小的问题上也无法达成一致,无论是人民党右翼和国家人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一致反对共和国的主要政治观点。当时人们流行的说法是,魏玛共和国政权是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政权。^④ 更为重要的是,党派政治上的尖锐对立,不仅发生在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即使是执政党内部,也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裂痕。所有这些形成巨大的逃离驱动力,使共和国在历史的洪流中仅仅昙花一现,这不仅导致德国自由运动的崩塌,也造成与之紧密相连的政治秩序的毁灭。1929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使脆弱摇摆中的魏玛共和国政府雪上加霜,可行性共识难以达成,进而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政策,当法西斯党以步履轻盈的姿态完成由民主向独裁的“合法”过渡之时,魏玛共和国也黯然谢幕了。

(二)意大利共和国

意大利的自由选举历史从 1945 年开始并未出现重大间断,它采取的是双选区制的比例代表制,高度发达的政党体制逐渐成为意大利民主的关键词。其下议院的选举制度是西欧中最具比例代表制特征的制度之一。上层选区为规模庞大的大型全国性选区,比例代表性几乎接近完全,为极小型政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比如,在 1946 年,意大利 556 席的上层选区,造成了选举制中最低的有效门槛,仅为 0.1%,因此战后的大多数时间里,意大利都拥有超大规模的内阁,议会中最大最强的政党是那些根植于国家政治传统中的政党,即天主教徒与社会主义者。^⑤ 因此,与魏玛共和国相同,意大利政党在意识形态光谱上的分布也分为左、中、右,但与魏玛政党体制相区别的是,意大利各政党在这三种意识形态倾向上,均存在着政党联盟。极左政党联盟支持的是未

① 由于各种政党派别的发展,当时除了各种直接政治性或教派性的社会团体外,各类组织更是数不胜数,而这样的社团又多是以军事形式组织起来。一个几乎没有军队的国家走上了社会军事化的道路。参见[法]里昂耐尔·理查尔:《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李未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8-122 页。

② 参见甘超英:《德国议会》,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3 页。

③ 参见[瑞士]埃里希·艾克:《魏玛共和国史》,高年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227 页。

④ 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3 页。

⑤ [美]阿伦·李帕特:《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5 页。

来的苏联式政体,同时也极力阻止大规模社会民主左翼的形成;极右翼表现出对过去贵族政体、民族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支持,以遏制更大范围内宪法权利的形成;左右联盟同时又支持一个广泛的中间政党联盟的存在,同时也为中左与中右位置的存在提供了可能。

由于社会与政治的分裂以及比例代表制的低门槛,大中小型的政党不断涌现,纷纷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具体而言,代表意大利政党联盟最左派的是两个产生于法西斯时期的大众政党,即共产党和社会党,并在1946年和1948年获得了大规模的代表席位。处于中左位置的是肇始于抵抗力量的政党,有行动党、民主劳动党、民主共和集团、社会-基督党以及农民运动,但在选举中所占比重不大。右翼政党联盟涵盖了天主教民主党、国家保皇党以及意大利社会运动,其中天主教民主党的势力最为强大。显示出中间倾向的是自由党与共和党。意大利政党体制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在1947年以前,以政党联盟为特征的意大利民主内阁,获得除了极右势力以外的所有政党的支持,这样的状况很快就被1948年4月的选举打破,由此开始了以天主教民主党、自由党、共和党与社会民主党的联合为特征的中间派时期,这可以称为第一个阶段。50年代末开始第二个阶段。由于中间联合出现危机,聚合性选举力量持续衰弱,更具异构性特征的中左政府开始掌握政治权力,包括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与社会民主党。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76年结束。在此期间,内阁高度不稳定,或者被中左联合或者仅仅只是被天主教民主党支持,并在某些情况下形成少数派政府。在第四阶段(1976-1979年),虽然被称作“国民联合”时期,政府也获得了共产党的支持,但是加入到议会的大多数政党却没有获得部长职位,这期间民主政权受到来自左翼和右翼极端势力的强烈攻击。1979年后进入到第五个阶段,仍旧以中右联合为特征,并首次出现了由非天主教民主党的两个政党领导的从1945年以来维持时间最长的内阁。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治动荡对意大利政党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党力量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但依然保持了中右联盟。^①

^① Luciano Bardi and Leonardo Morlino, "Italy", in Richard S. and Peter Mari et.al., *Party Organizations: A Data Handbook on Party Organiza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1960-90*,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p.458-618.

表 2 意大利下议院选举中的各政党所占份额 (1946-1979 年)

政党名称	1946	1948	1953	1958	1963	1968	1972	1976	1979
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	-	-	-	-	-	4.4	1.9	-	-
共产党	18.9	31.0	22.6	22.7	25.3	26.9	27.1	34.4	30.4
社会党	20.7		12.7	14.2	13.8	14.5	9.6	9.6	9.8
社会民主党	-	7.1	4.5	4.6	6.1			5.1	3.4
共和党	4.4	2.5	1.6	1.4	1.4	2.0	2.9	3.1	3.0
天主教民主党	35.1	48.5	40.1	42.3	38.3	39.1	38.7	38.7	38.3
自由党	6.8	3.8	3.0	3.5	7.0	5.8	3.9	1.3	1.9
保皇党	2.8	2.8	6.9	4.8	1.7	1.3	8.7	6.1	0.6
意大利社会运动 (新法西斯党)	-	2.0	5.8	4.8	5.1	4.5			
无产者联盟	-	-	-	-	-	-	0.7	-	1.4
无产民主党	-	-	-	-	-	-	-	1.5	0.8
激进党	-	-	-	-	-	-	-	1.1	3.5
其他	9.5	0.5	-	0.7	0.1	-	0.1	0.1	0.3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 Paolo Farneti, *The Italian Party System (1945-1980)*, London: Frances Pinter Publishers, 1985, p.4.

表 3 意大利下议院选举中的各政党所占份额 (1987-1999 年)

政党	1987	1992	1994	1996	1999
无产阶级民主党	1.7	—	—	—	—
重建共产党	—	5.6	6.0	8.6	4.3
意大利共产党人党	—	—	—	—	2.0
左翼民主人士党	26.2	16.1	20.4	21.1	17.4
网络党	—	1.9	1.9	—	—
绿党	2.5	2.8	2.7	2.5	1.8
基督教民主党/意大利人民党	34.3	29.7	11.1	6.8	4.3
利斯塔普罗迪——民主党	—	—	—	—	7.7
南蒂罗尔人民党	0.5	0.5	—	—	0.5

续表 3

意大利共和党	3.7	4.4	—	—	0.5
意大利新生党	—	—	—	4.3	1.1
民主联盟	—	—	1.2	—	—
激进党/利斯塔博尼诺	2.6	1.2	3.5	1.9	8.5
意大利社会党	14.3	13.6	2.2	—	2.0
社会民主人士党	2.9	2.7	—	—	—
塞尼公约	—	—	4.7	—	—
基督教民主联盟	—	—	—	5.8	2.1
基督教民主中心	—	—	—	—	2.6
意大利力量党	—	—	21.0	20.6	25.2
伦巴第/北方联盟	1.3	8.7	19.4	10.1	4.5
意大利自由党	2.1	2.8	—	—	—
意大利社会运动/民族联盟	5.9	5.4	13.5	15.7	10.3
三色火焰社会运动	—	—	—	0.9	1.6
其他政党	1.6	4.6	3.6	1.7	3.6

资料来源:意大利内政部官方网站, <http://www.interno.it>; [美]拉里·戴蒙德、理查德·冈瑟主编:《政党与民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通过分析选举份额的变化可以发现,在1979年之前,选举波动不大,趋势相当稳定,对于中心地带的拉力主要来自于左翼,但是左翼内部无法成为一个持续稳固的核心,因而无法产生强烈的逃离中心的倾向。在包含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政党联盟中,即使是一个最温和的社会主义联盟,即一个左翼联合政府也从未出现过。1976年左翼曾拥有微小的优势,但是逆流随之而来,很快重新下降到50%以下。从总体趋势上看,在1953-1958年的党派联合时期,意大利政党体制可以归纳为主导党制;在1958-1972年,甚至一直到1976年,都非常接近极化多党制,之后转变为温和多党制。与魏玛共和国最终由于离心运动造成政治体制的崩溃不同,意大利的反体制政党最终被重新合法化,离散趋势不断减弱,最终实现中心聚合力量对中心逃离模型的超越。

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极左或者极右主要政党的反对,一直是意大利政党体制运转的限制条件,但是这样的限制本身存在着结构性断裂。左派分为三个不同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社会党以及共产党。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它们之间的分割

依据依然可以理解为对于联合与联盟的态度、激进程度以及对民主制度的接受程度。但在此之后,社会民主党与社会党开始与右派形成大的政府联合,同时它们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冲突也被联合策略与政策差异所替代。因此,整体上来说,左翼难以形成一个“调和的中心”,所以这样的联合容易受到外界力量的损害,缺乏内部性平衡。同时共产党以及社会党难以达成具有基础意义的合作,导致了一致性力量难以持续,与右翼联盟的议价能力降低,也造成了在与政府以及反对派的力量对比中的制度性不平衡,这样的不平衡阻碍了左翼的拉力对中心形成的离心倾向。随着中心地带的政党数量增加,并且这些政党具有较弱的意识形态倾向,它们起到了对左翼和右翼的平衡作用;中间倾向政治力量的加强,不断吸收温和的左翼和右翼的政党向中心趋近,意识形态的弱化甚至造成了左派与右派的联合,最终导致两翼政党的去极化现象的发生。将意识形态这一控制性变量纳入其中进行考量,可以发现意大利反体制政党的中心逃离倾向得以不断弱化的外在表现。这样的作用可以通过以下三个衡量指标进行考察,分别是对经济发展的所持态度(参见图1)、国际关系态度(参见图2)以及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参见图3)。

图1 不同政党对经济发展方式所持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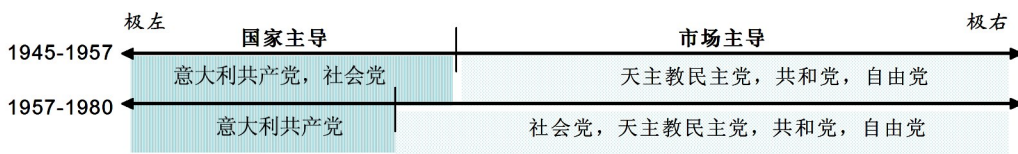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政党的国际关系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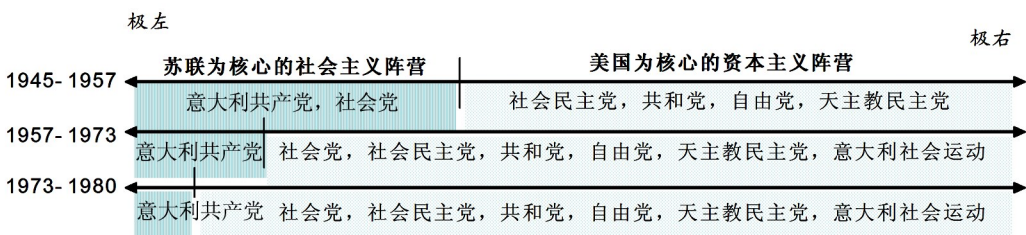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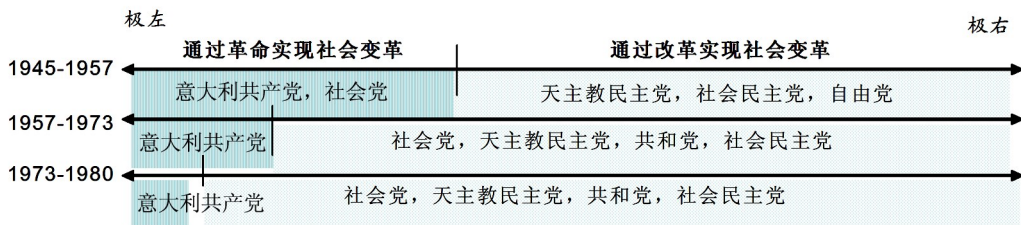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政党对社会变革所持态度



注:图为作者自制。

考察意大利不同政党对经济发展所持有的态度,可以以较为粗略的方式划分为以国家主导和以市场主导两个不同的原则取向,不同的政党在这一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知。正如图1所示,1945年到1957年,将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是意大利共产党与社会党共同的政治理念,强调两党在议会以及群众组织中“兄弟般的合作”。但是1957年社会党召开第三十二次代表大会,^①宣布放弃与意共的合作,展开同天主教人士的谈判与合作,寻求进入政府。自此之后,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促使社会党的观点转向与天主教民主党等传统右翼政党相一致,也就是积极倡导市场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不同政党的国际关系态度与社会变革态度也在不断变化(见图2、图3)。1945年到1957年,共产党与社会党都积极向苏联靠拢,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提倡以激进的革命方式实现国内的社会变革。1957年到1973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意大利社会党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从激进的革命派转向了较为温和的改革派,从反对党变成了执政党。1973年到1980年,不同政党意识形态之间的割裂程度进一步减轻。1973年,意共认为如果不能取得绝对多数的支持就难以上台执政,而天主教民主党不仅在中间阶层有群众基础,在工人阶级中也有大量的追随者,因此提出要与天主教民主党实行“历史性妥协”,实行“民主代替”而不是“左翼代替”。^②此后一直到1980年放弃这一战略,意大利共产党开始部分地抛弃原来的极左观念,逐渐向中心地带过渡,对资本主义道路以及社会变革观念保持同情态度,1978年甚至提出

① 意大利社会党第三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政策声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一致行动和协商的任何协定之外的。与天主教人士的谈判应该继续进行,使得一切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参见《各国社会党重要文件汇编》(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29-134页。

② 意共认为,在当时的意大利社会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形成了一个中间行业和中间阶层网,可统称为“中等阶层”,意共要团结人民的大多数。实现“民主代替”也就是要促使具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的人民力量同信仰天主教的人民力量以及具有其他民主倾向的力量进行合作。参见[意]贝林格:《贝林格言论集:1973-198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6页。

“第三条道路”，与右翼政党的对立色彩进一步淡化。

可以看到,即使以不同的指标进行衡量,意大利政党的意识形态都逐渐趋向于一致化,并且中心政党不断吸收温和的左翼和右翼政党向中心趋近,这样就促使了两翼政党的去极化现象的发生。以意大利共产党为例分析,可以清晰地发现反体制政党被重新合法化的过程。意大利共产党是意大利政治体制中的重要影响力量,在1946年获得了19%的选票,仅次于社会党,在左派政党中居第二位,在以后历次竞选中,它不仅确立了自己在左派政党中的统治地位,而且已成为一支有人民群众基础的巨大力量。^①可以说,在20世纪40年代,每个党员都是激进分子,但是到了60年代末,在12000-13000个分支机构中,大部分的政党积极分子只是各个分支中的一小部分人。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因素的变化,人们逐步意识到曾经出现的激进的社会革命时期已经过去,共产党也开始进行积极的和平民主运动,向整合型政党的方向转变。十年后,意大利共产党的全体成员不过是注册的会员。经历了1973年的去激进化时期,“国民联合”打败了恐怖主义,逐渐整合了共产主义者。^②到了1979年的政党大会,只有2000个基层组织单元出席。一方面,作为曾经是共产党最坚实支持者的意大利工业和农业人口不断缩减,造成了成员供给的动力持续下降。1976-1987年,意大利共产党共失去约230万选民的支持。在1989年召开的意共十八大上,这一传统的反体制政党宣布了各个方面的全面变革,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规律。^③另一方面,作为政党细胞的基层单元在不断地消失,成员逐渐退化成意识形态上的“同情者”或者仅仅只是选民。经过90年代的历史性变革,到了1991年2月,意大利共产党采用了一个新的名字——左翼民主党,以及新的标识,在经历了完全的转型之后,激进色彩已然褪去,极左的拉力不复存在。此外,另一个在80年代曾经旗帜鲜明的反体制政党北方联盟,在90年代以后由反抗运动党转变为执政党,也放弃了它最初激进的政党纲领——脱离联邦,成为个人魅力党。随着传统红色区域消失,极化多党制转变为温和多党制,以意大利力量党为核心的中右联盟获得了选举的胜利,政党体制实现了平稳转型。

^① 参见[法]热纳维埃夫·比布:《意大利政党》,葛增骧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9页。

^② 意大利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历史性妥协”的策略,奉行与社会党、天主教之间长期合作,共同实现本国社会变革的联盟战略。

^③ 参见史志钦:《意共的转型与意大利政治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2页。

四 分析与结论

位于意识形态光谱两极的反体制政党并不是静止孤立或单一存在,而是与中心地带的其他政党相互依存,表现出一种互动模式下的竞争状态。当两翼反体制政党的极端意识形态色彩逐渐弱化,且中心政党力量显示出更加强大的平衡作用,那么就会形成中心聚合模式,从而保证政治体系的稳定。但是如果选票不断流向于意识形态光谱左右两个极端政党,造成两翼拉力过大,形成对中心的超越,就会造成中心逃离模式,当极化力量超过制度能够承受的上限,就会发生政治体制的崩溃。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欧不同国家的政党竞争模式,可以发现即使是同样处于多党制中的反体制政党,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竞争模式,如果从模型建构的核心要素,即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位于空间竞争中的反体制政党,时时刻刻面临由意识形态造成的两难困境,也就是“政党意识形态悖论”的问题,不同政党在相异的政治环境中做出不同的策略选择,也就成为走向不同政治命运的关键。

第一,外部的选举策略。20世纪初期,在那些存在庞大政党机器的西方民主国家中,政党所面临的选民群体已然不是社会中的少数份子,选民规模不断扩大,致使运用传统政治恩赐或者庇护的手段去动员大众已经不能满足政治诉求,这就需要动用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尤其是一些选举主义政党,采纳更加强烈的意识形态承诺和对抗性模式来争取选民。吊诡的是,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趋向碎片化,在争夺选票的压力下,政党又不得不采用“全方位”的策略扩大选举基础,但无法回避的是,正如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所指出的,政党意识形态承诺的降低总是与全国领导权的“稀释”联系在一起。^① 这就要政党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以增强选举吸引力,一方面又要以最纯粹的方式坚持最初的意识形态来保持政党不发生碎片化。换言之,在竞争的压力下,一方面要求政党强化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又要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这样外部选举策略的两难就是“政党意识形态悖论”作用的结果。

第二,内部的政治交易。在政治过程中,政治行为的很大一部分发生在不可见的层面上。可见层面的政治会通过大众媒体逐渐社会化,而不可见层面的政治却与私下的交易息息相关。政党政治行为也在不可见与可见两个层面同时发生作用,一个政党

^① Otto Kirchheim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in Joseph L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 et al.,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77-200.

越是在可见层面树起色彩鲜明的意识形态旗帜,并纵容抬价政治,那么在不可见层面的调和度就越低,可见与不可见政治之间的距离就越大,这就是“政党意识形态悖论”的内部作用方式。在政党竞争的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博弈与实用主义层面的政治交易往往同时进行,并在很多情况下相互背离。因此,对于反体制政党而言,能否处理好这两个轨道上的问题,就成为关键。如果一个反体制政党在所有层次上都是逃离的,那么这样的政党在被体制整合的过程中,就面临重重困难,甚至导致爆炸性结局,这也就是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发生的状况。而当反体制政党的去合法性在某些层次受到制衡或者削弱,也就是在不可见层面的向心性整合得以实现,就能保持政治体制的稳定性运转,这也就是意大利政党体制得以持续稳定的原因。总之,能否在可见层面维护意识形态,在不可见层面保持实用主义,对于反体制政党而言,是不得不直面的抉择。

概括地说,“政党意识形态悖论”体现了两种矛盾:一种是在社会碎片化的压力下,强化与淡化政党意识形态的矛盾;另一种是在可见层面的意识形态博弈与不可见层面的政治交易的矛盾。如何合理审慎地处理这样的矛盾,成为反体制政党实现体制整合的关键。

从实践层面看,无论是魏玛还是意大利,共产党作为一个反体制政党,也都面临着这样的“意识形态悖论”。一方面是马列主义的一般原则和该党一贯确认的、自己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使命,另一方面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国家政策,一种为了使该党融入政治体系的必要妥协。在这样可见和不可见层面的双重矛盾下,共产党需要赢得选票以应对政治竞赛,同时也需要维护自己的信仰原则。魏玛共产党就在这样的两难抉择中陷入了内部派系斗争的漩涡中,无论在可见层面还是不可见层面都保持着对苏联的忠诚,甚至不惜压制国内社会民主党内的无产阶级。而意大利共产党虽然在表面上对苏联随声附和,避免政治孤立,但是实际上却甘愿抛弃列宁主义政党的各种特点,转向积极分享政治权力的活动,该党同天主教徒对话,并且对宪法的第七条^①投赞成票,这可以说是共产党在考虑到意大利天主教徒所拥有的强大力量后,表现出来最具政治现实主义特征的证据。在1948年到1968年间,几乎四分之三的意大利立法都得到了共产党的首肯,并且从那以后,任何一项提交议会的法案也都在事前与意大利共产党进行交易。^② 但是这样的立法大多数并非是就根本问题作出的,“积极的整合”更多发

① 宪法第七条即指“国家与天主教会各行其政,独立自主”。作者注。

② 参见[法]热纳维埃夫·比布:《意大利政党》,第72-76页。

生在政策层面,意大利共产党不得不考虑的是,如果在极端政策议程或者原则问题上妥协,就会面临失去那些最“忠诚”党员的风险。总而言之,位于意识形态极端位置的反体制政党能否在可见层面保持鲜明意识形态,同时在不可见层面保持与中间位置的政党的妥协,是向心性作用得以产生效用的关键。

20世纪90年代以后,冷战结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全球秩序发生重大改变,欧洲的政治环境被重新定义。国家角色被意识形态冲突所超越的情形不断减少,政治斗争的基础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问题,这成为许多西方学者的共识。^①但是,这样的变化并非意味着现代民主政治分歧的溶解以及法国大革命以来“左”与“右”观念的消失。社会总是处于不断的分化当中,所不同的只是如何分化而已。两极分化的新维度正不断改变着曾经“左”与“右”的内涵。传统上,左派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础,而右派以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为基础。而如今,左翼政党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重构为强调自由、环境保护主义、妇女平等、少数民族权利的形象,而右翼则扮演着经济保守和宗教传统维护者的角色。欧洲民主国家很大程度上仍然依据左与右的政治光谱来划分,只是左与右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虽然政党倾向于在经济等问题上采取中间立场,但是依然在不断寻找着新的政治分野。^②

经过20多年的分化、调整与重组,欧洲曾经的一些反体制政党经过去极化的作用,重新走向政治舞台,积极赢得选举并参与组建政府,甚至有些被当做新中间位置的政党。但是,当资本主义危机袭来,仍然有一些国家的执政党由于无法积极有效应对,导致各种现实问题的产生。而各种具有反体制特征的抗议型政党利用选民的不满或者敌对情绪,相继兴起。比如通过削减其他人的合法性而构建自己政治规则的新民粹主义政党,抨击体制规则的过时,宣称为社会主流说话。意大利北方联盟、法国国民阵线等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它们多数位于政治光谱的右侧。此外,原本汇集极左力量的共产党被“左翼联盟党团”取代,虽然其大部分是从旧有的共产党分离出来的,但是与传统的左翼政党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除了共产党以外,它也包含某些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及民粹社会主义政党等。这些反体制政党诞生于经济危机笼罩、失业率持续走高、选民不满情绪蔓延的欧洲社会中,也存在一些具有共通性的新特点。

第一,这些政党多是基于议题的反对,针对对象多是政府。它们为了最大限度地

^① 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285页。

^② 参见[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238页。

吸引选票而在很大程度上求助于政治标志和重大问题,甚至有时忽略纲领原则以及连续性;第二,这些抗议型政党虽然强调“反现存体制”,但是依然积极参加选举,依靠激情宣传与民众的不满情绪;第三,强大的极左政党与强大的极右政党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在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① 由于位于政治光谱中心位置的选民被一些大党或者政党联盟占据,这些政党多依靠下层选民或边缘群体,因此,选民经常发生交叉重合。这些在“政治机会”中通过寻找单一议题而产生的反体制政党虽然也位于政治光谱的两端,但是与曾经的革命型政党相比较,所引发的支持性匮乏确实没有那么严重,它们并不拒绝资产阶级的代表机构和议会,反而要最大限度地吸引选票。

这样的抗议型政党具有更强的议题导向,其意识形态的强度不如革命型政党强烈,但是依然具有去合法性的特点,同时也面临着意识形态悖论。一方面,由于纲领原则不鲜明,在政治的可见层面,它们要不断地与其他政党区别开来;另外,在实用主义层面,它们也需要对政府做出必要妥协。由于选票数量的不足,它们的力量并不十分强大,且较少在同一政治空间形成左右两极同时存在的拉力,所以中心逃离的趋势在一定时间内难以显现。也应当看到,目前表面上聚合模式占主导的平稳状态,并不能掩盖和消解如何将反体制政党重新合法化这一持续性问题。由于多是抗议型政党,原则性不强,所以在不可见层面这些反体制政党更容易被整合。但是反体制政党的各个层面都实现重新合法化也并非易事,精英的转化与选民的转化必然面临不同的条件,合法化也面临社会渗透程度的问题。今后,实现反体制政党整合的另一关键,在于能否在一段时间内把这样的政党吸收到现存的政治秩序中。

(作者简介:李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张海洋)

^① 轩传树、朱美荣:“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欧洲极左政党现状分析”,《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6期,第141-143页。